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國勞資關係的轉型

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 中國勞資關係轉型

鄧子華 沈嘉
潘毅 李卓怡

2010年注定是中國工人歷史上的一個特別時期。勞方、資方和政府之間出現了甚麼問題？為甚麼這些年輕的農民工採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議方式——在富士康是個體主義的自殺，而在本田等工廠則是大規模的集體行動？

2010年注定是中國工人歷史上的一個特別時期。

1月23日凌晨，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以下簡稱「富士康」）員工馬向前墜樓身亡。在其後的短短幾個月裏，富士康的不同廠區接連發生十幾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僅5月一個月就有7名員工自殺，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面對指責，富士康總裁郭台銘堅稱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亦稱大多數自殺與富士康無關。從1月至8月底，有16名富士康員工墜樓，其中14人死亡，2人重傷致殘；此外還有1人割脈自殺未遂^①。

5月17日，廣東佛山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數百名工人因不滿工資低、實習生待遇差、中日員工同工不同酬而集體罷工；20日，勞資雙方進行談判；24日，本田公司解僱了帶頭罷工的兩名工人；31日，罷工事件升級，罷工工人與南海獅山鎮總工會人員發生肢體衝突，數名員工被打傷。罷工期間，本田在中國的整車生產企業均被迫停工停產，每日產值損失超過兩億元。6月4日，在廣東省總工會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經過談判，勞、資、政府三方簽訂協議，廠方在員工現行的工資基礎上提高33%，約增加500元。罷工最終以工人的勝利而告終。

以罷工方式表達訴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還有：

5月5日南京新蘇熱電公司罷工；

5月14日河南平頂山棉紡廠罷工；

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罷工；

6月5日江蘇昆山書元機械廠罷工；

6月6日深圳美律電子廠罷工

……

這一系列的工廠事件向整個社會畫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們究竟身處何種時代？勞方、資方和政府之間出現了甚麼問題？面對工人的抗爭行動，我們首先會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時點：為甚麼農民工的抗爭會在這個時段上普遍爆發？另一個是方式：為甚麼這些年輕的農民工採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議方式——在富士康是個體主義的自殺，而在本田等工廠則是大規模的集體行動？

一 新生代農民工與抗爭時代的來臨

在當今中國的勞動大軍(特別是「世界工廠」)中，「新生代」農民工是主要構成部分。所謂「新生代」是一個相對性概念，旨在說明他們與1990年代開始大規模流動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代際差異。新生代農民工大多為所謂「80後」和「90後」的年青人，除了建築業的企業以包工方式運作因而工人年齡偏大(多數在40至50歲)外，在各類代工企業中工作的工人幾乎全部為新生代。據廣東省最近的調查表明，該省「80後」、「90後」農民工為1,978萬人，佔全省農民工總量的75%^②。這些在富士康一類的企業中工作的年輕人與在建築業打工的工人恰好構成兩代農民工。以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中的工人為例，他們中年齡最大的28歲，最小的17歲，大多分布在18至25歲之間。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做出有效回答的富士康受訪者中，平均年齡為21.1歲。而南海本田罷工的參與者也以「80後」、「90後」的新生代工人為主體，作為組織和領導者的也是兩名「80後」的湖南籍工人；而他們在溝通方式上也使用了QQ、互聯網等青年工人最喜愛和擅長的方法。

新生代農工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並非僅僅因其年齡較輕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階級身份認同交織在一個新的「世界工廠」時代。與其父輩相比，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折射出「新生代」作為制度範疇，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所具有的不同關係。

具體而言，其一，新生代農民工與鄉土社會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他們中的相當部分已經不是成長於農村環境，對於村莊和親屬關係並無父輩那種情感與認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不掌握農業生產技能，甚至從未有過務農經驗，基本上是一畢業就開始打工。由於與上一代人的經驗參照系全然不同，他們對於土地、鄉村都沒有深厚的歸屬感。他們不願再回到農村生活，對未來的預期與其父輩很不一樣，不會做出落葉歸根的選擇。

其二，新生代農民工受過更多的教育，比父輩文化程度要高。他們大多受過基本教育，很多人受過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在富士康工人問卷調查的1,650個

新生代農工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並非僅僅因其年齡較輕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階級身份認同交織在一個新的「世界工廠」時代。與其父輩相比，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折射出「新生代」作為制度範疇，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所具有的不同關係。

有效回答中，擁有高中、中專、技校、高職、中技(以上均屬於九年義務教育之後所接受的更高一級的三年制教育)學歷者的佔比為56.9%，擁有初中學歷者的佔比為27.6%，擁有高中以上(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者的佔比為13.6%。不言而喻，教育和知識結構的變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觀念與行為有着重要的影響。

其三，新生代農民工是認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代，他們在城市中工作，也希望能夠真正在城市中立足。他們的消費觀念、娛樂方式、社會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遠離他們的父母一代，有着強烈的融入城市社會的願望。但現實與願望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們渴望融入城市卻又無法融入。由於身份制度造成的壁壘，他們在就業、住房、醫療、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都遭遇無法克服的障礙。城市化，對他們而言就像一個近在咫尺卻觸摸不到的夢。農村回不去，城市進不來，他們因此而成為「無家可歸」、飄泊無根的一代。

其四，新生代農民工更缺少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網絡。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無論在工作中還是在生活上都更少與親屬、鄰里、同鄉等傳統社會關係保持密切聯繫。有研究表明，上一代農民工離開鄉土進入勞動力市場主要依靠的是上述傳統社會關係網，他們也從中獲得重要的社會支持^③。而新生代則缺少了這樣的網絡，加之許多企業如富士康有意地限制其帶入原有社會關係，造成這一代青年工人更為原子化的狀態，孤獨、冷漠、脆弱、沉默，互不相識，很少交往，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更加無依無靠。

最後，由於上述特點的存在，新生代農民工有着與上一代非常不同的價值觀念。他們比其父輩具有更強烈的不公平感，他們對於種種社會不公正也更為敏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拋棄了上一代人常常懷有的宿命論，他們不認命，有着強烈的表達利益訴求的動力和對未來更好生活的要求^④。

有着如上特點的新生代正在成為農民工的主體。面對這樣的新一代農民工，整個體制包括企業、政府和社會仍然沿用應付老一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無疑會產生巨大的矛盾，發生各種各樣的悲慘事件。以富士康工人連續多起跳樓自殺事件為例，將事件原因歸結為青年工人個體心理問題、請心理學家進行輔導干預，以及歸因於企業「運勢」、「風水」問題、請和尚道士唸經驅邪，都屬罔顧真相、混淆是非的做法，也是對死者生命的不尊重。富士康事件是社會性的事件，而不是個人心理問題；其實質關乎整個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生存狀況和價值訴求，也關涉到血汗工廠制度和「中國製造」模式的根本問題^⑤。

工資，是不同形式抗爭的首要目標。無論是富士康工人以自殺表達無聲的抗議還是本田工人的罷工行動，都與提高工資的要求有關，資方應對工人訴求首先的着眼點也通常在最低工資上。但必須看到，工人對工資的要求不僅僅是提高最低工資，而是要求生活工資，即工資能夠維持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台資和外商企業在應對外界有關低工資的批評時，經常會強調自己的工資水平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而且比許多中小企業還高。但實際上，工資標準的確

富士康事件是社會性的事件，而不是個人心理問題；其實質關乎整個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生存狀況和價值訴求，也關涉到血汗工廠制度和「中國製造」模式的根本問題。「中國製造」模式使工人被製造成生產流水線上的工具甚至零件，連機器都不如。

定應該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為準，而不是僅僅維持勞動力自身的生存為準；也就是說，工資應該滿足一個工人的個人和家庭生活開支以及未來發展和風險抵禦等。工人勞動賺取工資是為了生活，而不僅僅是為了活着。當工人拼命工作也掙不到生活工資而且看不到前景的時候，憤怒和絕望便油然而生。

非人性化的、嚴苛的勞動管理體制剝奪的是工人有尊嚴的勞動權利。低廉的工資，微薄的加班費，漫長的勞動時間，枯燥的工作程序，無處不在的監視、訓斥甚至打罵，「中國製造」模式使工人被製造成生產流水線上的工具甚至零件，連機器都不如。同時還伴有「服從、服從、絕對服從」和學習「總裁語錄」的「思想改造」與精神控制，這些都旨在將工人規訓成靈巧、馴服而廉價的工具。如此低收入、高強度、無尊嚴的勞動過程導致以極端方式如自殺或集體反抗如罷工來表達訴求，都不是難以想像的事。

社會性弱化、正常的社會生活缺失，是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又一困境。人是社會動物，人的存在是社會性存在。人一旦缺少必要的社會關係、社會生活時，就變成原子化的個體，舉目無親，孤獨脆弱。與此同時，工會角色缺失也是工人社會性弱化的表現。

在號稱工會覆蓋率達100%的富士康深圳廠區，問卷調查受訪者中高達32.6%的被訪工人根本不知道富士康有沒有工會甚至以為沒有工會；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參加工會的工人僅為10.3%。工人參與率低，工會成為資方管理的附庸，工會未能盡職盡責為工人服務，這成為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無助和絕望的原因之一。工人的聲音得不到傾聽，訴求得不到滿足，最終只能被迫沉默。要改變這種狀況，工會就必須改變目前這種作為資方附庸的角色，回歸以工人為本、切實為工人謀福利的角色。如若政府不去做或者做不到保護勞工權益，那麼至少應該向社會開放合法性空間：讓勞工自己的組織去幫助工人，發揮作用；同時讓有關社會組織乃至全社會來關注和幫助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

壟斷型資本的出現，背後的支持力量是國家權力。作為權力機構的政府放任資本之惡、放棄監管之責、不作為甚至與資本強強聯合，使之成為不受任何制約的強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勢、絕望和各種形式抗爭的重要動因。



走在路上的富士康工人

富士康這類企業雖號稱「代工帝國」，實則處於跨國資本鏈條的末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的運作邏輯及其壓榨性的殘酷不應忽視。以蘋果公司 (Apple Inc.) 的產品為例，在其整個生產鏈中，最不值錢的是生產和組裝。一部售價600美元的iPhone 4，所需材料成本約為187.51美元，將這些元件進行組裝的富士康只得到每台6.54美元的酬勞，60%的利潤被蘋果公司拿走。蘋果公司一方面要求供應商嚴格控制品質，一方面利用其強勢地位不斷壓低採購價格，這使得代工企業利潤低廉，它們遂轉回頭通過壓榨工人來維持利潤。全球化資本的運作就是以這種「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方式來進行，最後的犧牲品就是處於這個食物鏈最底端的工人^⑥。

當我們揭示全球化資本對工人的剝奪和異化時，不能忽視國家權力的作用。我們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國家主導的資本全球化過程——改革開放後，國家通過鼓勵外資和對外開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資或外資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⑦。這種以依靠外國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的發展模式，區別於東歐的轉型市場或者東亞的發展型國家模式，雖然帶來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產生了普遍性的社會不平等，尤其是導致了工人群體的困境^⑧。壟斷型資本的出現，背後的支持力量是國家權力，從而影響着一個新的制度化的勞資關係的形成。過去我們或許相信進一步深化改革或者更多的外國資本的流入能夠加強對勞動者法律保護的基礎，然而壟斷型資本的出現卻使我們對此表示懷疑^⑨。富士康作為製造業中的傳奇，其在中國各省份資本擴張的速度和規模都是極具代表性的。作為權力機構的政府放任資本之惡、放棄監管之責、不作為甚至與資本強強聯合，使之成為不受任何制約的強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勢、絕望和各種形式抗爭的重要動因。

新生代已經成為農民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於現行的城鄉分割的戶籍體制和其他種種制度安排，新生代農民工處於比其父輩更為尷尬的境地，他們不能退回鄉村，但是他們也絕難融入城市。這一處境可用「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加以描述。

二 工廠專制形態與工人的抗爭方式

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標誌着農民工階級日漸完成自身內部的代際更替，新生代已經成為農民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於現行的城鄉分割的戶籍體制和其他種種制度安排，新生代農民工處於比其父輩更為尷尬的境地，他們不能退回鄉村，但是他們也絕難融入城市。這一處境可用「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加以描述。所謂「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是指保留了小塊土地的農民工家庭實際上保留着小私有者的尾巴，使得他們不可能像經典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那樣一無所有，可以徹底地融入工業生產體系和城市生活^⑩。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由於上述不同於其父輩的訴求和期望，他們在進入城市生活方式受阻時就會採取各種抗爭行動。

「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的解釋思路抓住了問題的一個重要側面。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若干不同於其父輩的一些獨有特徵——由於這些特徵，伴隨着農民工階級完成代際繼替的社會後果，必定是對資本與權力壓迫的日益增多的抗爭^⑪。

這就多少解釋了為甚麼在新世紀頭十年接近尾聲之際，農民工階級迅速改變了自己馴服、沉默的形象，展示出抗爭、表達的趨勢。但同樣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特徵並非僅僅基於年齡差異而來，更不能歸結為青年人的心理問題，而是深刻地折射出當今中國基本制度安排的約束和影響，體現出農民工階級再生產的悖謬邏輯。

如果說，處於「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狀態的新生代農民工孕育的強烈不滿情緒，必定促使他們採取較之父輩更多的抗爭行動，那麼，他們的抗爭行動為甚麼會採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在南海本田，是集體主義的行動方式——集體罷工，而在深圳富士康，則是典型的個人主義行動方式——接踵而來的跳樓自殺？

在此，讓我們引入另一個理論視角，即「工廠政體」(factory regime)的理論。「工廠政體」是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概念，包含四個基本環節，即「勞動過程」、「勞動力再生產方式」、「國家干預」和「市場競爭」。這四個環節把微觀的工廠場景與宏觀的制度背景勾連起來，它們共同作用，塑造了工人的行動方式和行動能力。在布洛維看來，資本主義的工廠政體可以劃分為兩個類型，一個是「工廠專制政體」(factory despotism)，另一個是「霸權政體」(hegemony)。這兩種生產政體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和壟斷階段分別關聯的^②。

自二十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發生了從工廠專制政體到霸權政體的轉變。在工廠專制政體下，資本赤裸裸地威嚇和剝削工人，榨取剩餘價值。但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由於國家立法對勞資關係的干預，尤其是社會保險法使得工人不再完全依賴於工廠工作，也有可能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這就迫使資本家放棄了對工人那種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轉而通過「趕工遊戲」(the game of making-out)、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國家等機制，塑造工人對剝削的「甘願」(consent)，換取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服從，甚至把工人變成了「剝削自己的幫兇」。當然，工廠專制政體和霸權政體仍然只是工廠政體的兩種理想類型，現實工業生產中的任何工廠政體，都可以被視為工人的「甘願」與資本支配兩者的結合，不過比重有所不同而已^③。同時，布洛維也忽視了發達國家工人的「甘願」，是因為階級矛盾已經通過大量資本輸出轉嫁給第三世界的老百姓這一因素。

不過，用「工廠政體」的概念工具透視當代中國的勞資關係和農民工的抗爭方式，至少可以使我們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農民工群體就業的大多數工廠都屬於典型的工廠專制政體，遠未達到霸權政體的階段。不加掩飾的壓迫和剝削，仍然是資本治理農民工的主要方式^④。

工廠專制政體在實踐形態上又可分為諸多不同的亞形態。例如，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將富士康工廠稱作「準軍事化的工廠專制政體」，它至少具有四個顯著特點：第一，高強度的勞動過程、超長勞動時間和低廉的工資；第二，工人宿舍位於廠區之內，成為車間專制政體的延伸；第三，除生產線上的工作關係外，工人之間的其他社會紐帶幾近全部毀壞；第四，準軍事化的管理。

生產車間與宿舍管理緊密結合的工廠體制構成了龐大的、中國所特有的宿舍勞動體制。這是富士康「帝國」存在的秘訣，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勞動力，規訓着工人的肉體與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樣的管理體制直接造成工人的異化和集體性心理創傷。

2010年10月發布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系列報告〉分析探討了富士康的勞動管理體制，即以高強度、超時生產、低工資和低消費成本來達到生產效率及利潤的最大化，通過暴力規訓、意識灌輸及分化工人來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及以犧牲工人尊嚴、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廠飯堂與宿舍等生活區，甚至工廠以外的社區，都不過是生產車間的延續，是工廠低成本運行的體現，它們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國」的版圖之內。這種生產車間與宿舍管理緊密結合的工廠體制構成了龐大的、中國所特有的宿舍勞動體制。這也是富士康「帝國」存在的秘訣，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勞動力，規訓着工人的肉體與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對工人進行二十四小時「全景敞開式」的控制，這樣的管理體制直接造成工人的異化和集體性心理創傷。這種極為嚴苛的工廠專制政體導致的結果是，工人不僅被商品化了，而且更被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工人被剝奪了採取集體行動的各種資源，只能採取原子化的反抗方式，自殺則是選擇用生命來表達無聲的反抗。

是否存在既定的社會關係，對於農民工的抗爭方式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被商品化和被原子化的條件下，農民工的反抗採取了個人主義的方式，如自殺；而在雖被商品化但未被原子化的條件下，農民工的反抗多半採取了集體主義的方式，如罷工。

與富士康一類的企業相比，作為外資企業的南海本田一類的企業可被稱為「常規的工廠專制政體」，它也有四個基本特點：第一，高強度的勞動過程和相對低廉的工資；第二，工人宿舍部分地坐落於周邊社區，而非全部被廠區包圍；第三，許多工人有同學、同鄉等關係，也就是說，保留了各種先前形成的社會關係；第四，常規管理，手段遠不如富士康那樣嚴苛。

就上述第一點來看，南海本田和富士康並無多大區別；在此意義上，兩者都屬於工廠專制政體。但是後三點則與富士康不同，南海本田工人保留了原有的各種社會關係，使其成為日後集體抗爭的可用資源。而不那麼嚴苛的管理體制和逃脫了工廠全方位控制的宿舍體制，則為開展集體動員提供了條件。手機、QQ等現代數字通訊方式為工人提供了經由虛擬社區走向實體社會行動的重要路徑。就此而言，南海本田的工人，雖然也同樣地被商品化了，但是卻沒有被徹底地原子化。他們的抗爭也就可能採取集體行動方式，即罷工。

南海本田工人的罷工抗爭，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來，大大小小的罷工此起彼伏。其令人矚目在於具有現代工人運動特點和更為積極的結果。罷工以合法合理的方式進行，保持了和平、理性的基調；具有現代意識的青年農民工成為發起者，「80後」、「90後」工人成為與資方抗爭的主要力量；在罷工中，工人的訴求兼顧了不同群體，如正式工和實習生的利益，形成更廣泛的團結；充分利用現代方式作為鬥爭手段，通過QQ互相聯絡，在罷工前就通知媒體，在罷工中及時向外公布罷工最新進展，以積極正面的姿態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工人第一次爭取組織權，要求有代表自己的實體組織，他們除了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更喊出了「重整工會」的聲音，這被視為工人的組織權訴求第一次來自於底層工人^⑩。

通過對上述工人抗爭特點的觀察，可以發現這類抗爭的結構性原因：新生代農民工遭遇工廠專制政體和支持此種工廠專制主義的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

勢必走上反抗的道路；而工廠專制政體的不同形態，則決定了農民工的反抗會採取不同的方式：是否存在既定的社會關係，對於農民工的抗爭方式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被商品化同時又被原子化的條件下，農民工的反抗採取了個人主義的方式，其結局是一個個年輕生命的毀滅，令人痛惜不已；而在雖然被商品化但是仍然存留了社會關係聯接，即未被原子化的條件下，農民工的反抗多半採取了集體主義的方式，這首先指向罷工，也包括集體談判等形式。

工人之間既定社會關係的存在與否，這種關係能否在抗爭實踐中擴展並形成內部團結，是欠缺工會組織的工人是否可能組織起集體反抗的先決條件。不過，無論是甚麼形態的抗爭活動，都會形成一種巨大的動力，推動當代中國勞資關係的轉型，而其含義，則是現行的工廠專制政體已經走到了盡頭，面臨着最終的崩解。

三 「中國製造」的終結？

新生的勞動力量對三十年來陳舊的工廠政體框架的猛烈衝擊，預示了當代中國勞資關係面臨轉型。這一轉型的前景可以從資本、國家和社會三個面向來理解。

資本走到哪裏，衝突就跟隨到哪裏。新生代農民工與各種形態的工廠專制政體的衝突將會愈來愈頻發和激烈，而這似乎預示着「中國製造」作為一種增長模式的終結。我們深知，富士康這類將代工行業做到「極致」的「超級世界工廠」，只不過是中國眾多代工廠中的代表，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一個縮影。號稱「帝國」或「王國」的富士康，擁有十一個「事業群」（生產基地），其龐大和「輝煌」

號稱「帝國」或「王國」的富士康，其龐大和「輝煌」與工人的弱勢構成強烈的反差，印證了權力—資本—勞工關係的失衡。調整這種失衡的關係，必須從改變廉價勞動力發展策略和廢除專制的管理體制開始。



太原富士康工廠大門

與工人的弱勢構成強烈的反差，而這類詞彙恰好印證了勞資關係的嚴重失衡，亦即權力—資本—勞工關係的失衡。調整這種失衡的關係，必須從改變廉價勞動力發展策略和廢除專制的管理體制開始，以工資增長和人性管理等更加人道的工廠政體替代之。

在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富士康這類勞動管理體制的形成不光是富士康企業本身的「傑作」，更離不開國家和跨國資本的「支持」力量。如前所述，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該政策通過維持勞動力的低工資和低權益，吸引國內外資本投資，富士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實現了贏利的快速增長；而與此同時，跨國資本的獲利本性和運作邏輯將富士康置於利益鏈條的末端，使這類「代工帝國」為了獲取微薄的利潤轉而更殘酷地壓榨工人，將工人迫入悲慘的境地。

要改變極不均衡的勞資關係，必須向工人賦權，包括「勞工三權」的逐步合法化與真正落實，即工人享有團結權、談判權與集體行動權。如此才有可能建立起勞資雙方的利益博弈機制，使工人有能力參與工資共決、集體談判等保護自身權益的過程。

要改變極不均衡的勞資關係，必須向工人賦權，即工人享有團結權、談判權與集體行動權。如此才有可能建立起勞資雙方的利益博弈機制，使工人有能力參與工資共決、集體談判等保護自身權益的過程。

就整個國家來說，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製造」的發展模式，國家應該而且必須站在勞工一方，並承擔主張和實現社會公正的責任。中國號稱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立國的，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是用來聲稱的，也不是用來標榜的，而是要落實到千千萬萬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上，也要體現在工人權利的實現與保證上。

在以往發展主義的話語下，農民工的權益長期被忽略。與西方國家「資方—國家—工會」的三方制衡機制不同，中國工人缺乏工會的保護，而與資方連手的地方政府又難以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利。此外，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農民工難以完成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使得富士康這類企業能夠通過宿舍勞動體制盡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而支付僅夠他們生存的薪水，致使他們無法真正在城市中立足。新生代農民工的被動與尷尬在於，他們沒有身份認同——他們的身份既非農民也非工人；他們貌似工人地在工廠流水線上工作，但他們卻無從積累日後的保障與福利；他們的工作是有時間性的，一旦過了打工的黃金年齡，他們就會自動或被迫離開工廠；他們雖然是在城市的工廠打工，但是身處在城鄉結合部的工業園區裏，遠離市區，周末也需要加班，更無法獲得城市的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的如此處境，政府除了制約資本的過度膨脹、迫使企業落實勞動法、摒棄工廠專制政體外，還需轉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在國家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作為城市建設的中堅力量，新生代農民工希望也理當在城市獲得他們有尊嚴的經濟收入、社會保障、生活方式以及個人發展機會。這主要是指他們能夠有規劃與選擇的自由，能夠在城市工廠享有職業培訓、再教育、再生產的機會與空間。政府有責任使農民工在住房、教育、醫療

和福利等各方面享有社區公民的權利，並融入城市生活。概言之，「中國特色」不應是「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

轉變「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更要靠工人自組織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這需要波蘭尼 (Karl Polanyi) 意義上的「能動社會」(Active Society) 的建設。所謂「能動社會」，是指與市場擴張相抗衡的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面對市場的侵蝕和資本的膨脹，社會本身展開動員，產生出各種社會規範和制度安排，諸如工會、合作社、爭取減少工作時間的工廠運動組織、爭取擴大政治權利的憲章運動，以及政黨的初步發展等，以此來抵禦和規制市場^①。

如上所述的農民工的各種權利，除了要從法律法規上進行保護外，更需要培養農民工內生的集體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組織——工會，通過工會去爭取有尊嚴的工作與生活。這包括建立和完善工會組織制度：通過把工會組織落實到車間基層，特別是經由工人民主選舉而產生，使工會真正成為能夠代表和保護工人利益的工人自己的組織；也包括使工人充分認識自己的結構力量，努力增強自己在工廠和社區中的結社能力，逐步賦予工人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集體爭議權，以增強工人的集體能力，切實保護工人權益。「能動社會」的建設還應着眼於整個社會對於勞工權益的關注和支持，勞工NGO的健康發展、對資本形成制約的消費者運動都應成為社會建設的內容。

歷史是不斷前進的。如果說在改革初期，市場經濟的原始積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付出和犧牲之上，那麼現在改革開放已超過三十年，經過兩代農民工的努力，國家經濟水平提高了，社會整體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對更富裕了，如果我們仍然要靠盤剝農民工來營造所謂的「盛世」景象，那不得不說是整個社會的悲哀與羞恥。

新生代農民工不同形式的抗爭已經告訴我們：「低人權優勢」不可持續，「中國製造」模式走到了盡頭。農民工必須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和權利，才能轉化成真正的中國產業工人。而這樣的轉化除了能為農民工賦權，更是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必然需要，是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的提升。而這一轉型的進程將表明：農民工階級不再只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而將成為一股有能力自覺地干預歷史進程的力量。

新生代農民工不同形式的抗爭已經告訴我們：「低人權優勢」不可持續，「中國製造」模式走到了盡頭。農民工必須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和權利，才能轉化成真正的中國產業工人。而這樣的轉化除了能為農民工賦權，更是產業轉型與升級的必然需要。

註釋

① 參見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系列報告〉(2010年10月)，<http://fushikdc.blog.163.com/blog/#m=0>。文中提及的問卷調查均出自此註，下引不再另註。

② 〈廣東農民工新生代佔75% 就業觀念轉變倒逼企業〉，《廣州日報》，2010年2月26日。

③ 參見郭于華等：〈關係資本·網絡型流動·鄉土性勞動力市場問題的提出〉，載孫立主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中國社會調查》(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頁193-222。

④ 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8 (June 2009): 287-303; Leung Pak Nang and Pun Ngai, "The Radicalis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Working Class: 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Gemstone Industry",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 issue 3 (2009): 551-65.

⑤ 潘毅、盧暉臨、郭于華、沈原主編：《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

⑥ 參見〈2010年我國十大勞工事件回顧〉，轉引自紅別民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6bc8c0100orma.html。

⑦ Scott Wilson, *Remade in China: Foreign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oug Guthrie,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Doug Guthri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Mary E.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⑧ Mark Selden and Jieh-min Wu, "The Chinese State, Suppressed Consumption and Structures of Inequality in Two Epochs", manuscript.

⑨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Michael A. Santoro, *Profits and Principles: Global Capitalism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Donald C. Clarke,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since 1995: Steady Development and Striking Continu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1 (September 2007): 555-66; Mary E.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Doug Guthrie,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⑩ 潘毅等：〈農民工：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開放時代》，2009年第6期，頁1-20。

⑪ Pun Ngai and Lu Huilin,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 no. 5 (2010): 493-519.

⑫⑬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5).

⑭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沈原：《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學的關鍵議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194-270。

⑮ 〈工會角色缺位 誰為我說話〉（2010年8月9日），城邊村，www.chengbiancun.com/2010/0809/9268.html。

⑯ 參見波蘭尼 (Karl Polanyi) 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頁112-86。

郭于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沈原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盧暉臨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